

当前位置: 首页>期刊文章

[【小中大】](#) [【打印】](#) [【关闭窗口】](#) [【PDF版查看】](#)

转载需注明出处

《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 第2期 (2004):

科技与社会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苏联“无产阶级生物学”

埃·伊·科尔钦斯基<sup>[1]</sup>

**摘要** 文章回顾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在生物学领域创建“无产阶级生物学”的事件，包括“无产阶级生物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发展“无产阶级生物学”上的差异，以及开展“文化革命”来建立“无产阶级生物学”的努力。作者认为，尽管“无产阶级生物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获得成功，但它对日后苏联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李森科主义的兴起，产生过重要影响。

**关键词** 苏联 无产阶级生物学 文化革命 普列津特 李森科 米丘林生物学

## 一 引言

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初期俄罗斯科学界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变：新的国家政策是建立军事工业基地、改革农业、开创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提高苏联的国际地位，科学成了为国家政策提供意识形态辩护的工具。20年代末，西方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sup>[2]</sup>，由此引发了人们对“科学出路”的思考。苏联政府为了摆脱本国的危机，便利用各种手段来调动和控制科技界的力量。布尔什维克领导者对科学的这种普罗米修斯般的信仰，促使他们开办各类新的科学机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成立新的学会，创办新的刊物，出版学术著作，其数量之大足以令外国学者瞠目结舌。在国家成为科研经费唯一来源的条件下，科学研究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所必然。

在各门自然科学中，生物学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最为敏感的地带。近年来，俄罗斯（包括苏联末期）出版了大量文献，从科学、意识形态和政权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就导致这种敏感性的原因和生物学家们的行为动机进行了分析[Weiner, 1988; Joravsky, 1989; Вейрау, 1993; Josephson, 1996; Krementsov, 1997]。值得注意的是，以前通常只注重研究李森科（Трофима Д. Лысенко）<sup>[3]</sup>的活动及其与党和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Medvedev, 1969; Joravsky, 1970; Soyfer, 1992]，但往往没有考虑到李森科对生物学的影响与20世纪20-30年代初期许多人曾企图建立“无产阶级生物学”这一事件密切相关。在那个年代，其实不仅是政治领袖，而且更多的是学者们自己，提出了类似设想。学者们积极参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机构；在各种社会、政治和哲学杂志中发表文章，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各部门自然科学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在此背景下，生物学界对科研的计划化和研究课题的指令性政策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由此引发了内部斗争。这场斗争反映了教条主义对科学的危害，同时也展示了科学家在权力面前的行为。

一些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在1929-1932年苏联“文化革命”时期的活动，是苏联生物学界产生李森科现象最重要的先决条件[Fitzpatrick, 1978; 1992]。日后成为李森科的得力助手和思想顾问的普列津特（Исай И. Презент），当时就曾领导了其中的部分活动。尽管早期档案资料匮乏，本人仍力求证明，与建立“无产阶级生物学”直接相关的那些事件，特别是“文化革命”事件，影响了后来苏联生物学的发展。



科学文化评论

## 二 “无产阶级生物学”的由来

在苏联政权建立初期，政府对研究所、实验室、博物馆和高等院校的各种活动实施审查制度，对自然科学逐步采取意识形态化的方针。为了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马克思主义干部，政府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组织机构，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研究院、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和季米里亚泽夫科学研究所。

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研究院组建于1918年，1923年更名为共产主义研究院。1925年4月，在研究院中成立了自然科学部。这个部门享受政府研究津贴，其主要任务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捍卫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研究院与苏联科学院在早期所形成的学术竞争曾经为促进俄罗斯科学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许多富有才华的年轻生物学家参与了这种竞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主义研究院的活动家们就像天女散花一样向苏联科学院倾洒各种政治观点，学术竞争再也无法正常地进行下去。

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成立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研究院，两年后又建立了红色教授学院[Козлова Л.А., 1994; David-Fox, 1997; Behrendt L.-D., 1997; Берендт Л. Д., 2002]。校方为了培养在自然科学领域工作的党的年轻干部，特别安排了宽松的教学计划。根据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塔姆(Игорь Е. Тамм)的回忆：“这里提供了食品、住房、薪金等一切物质条件，安排了学习任务”，唯一目的就是“在哲学、科学和社会问题中贯彻唯物主义世界观”[Тамм, 1995]。

季米里亚泽夫科学研究所于1924年组建。该研究所在章程中首次标明：这是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机构，但只有那些“具有唯物主义观点的自然科学家”才能在该所工作，该所某些研究部门的成员已经具备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大学和研究所之外，还有专门在自然科学家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协会[④]，它们逐步取代了相继被停办的各科学协会[⑤]。与此同时，部分社会科学、哲学和政治刊物[⑥]陆续刊登系列文章，探讨有关进化论、生理学、遗传学和优生学的哲学问题。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和理论基础，就这样在生物学界逐步确立起来。

初期从事上述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生物学仅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因此只能简单地套用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观点[⑦]。哲学家指责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科学家认为他们对生物学一窍不通。他们的地位很快就被生物学家取代了。

1925年，植物学家科佐-波利扬斯基(Борис М. Козо-Полянский)、系统论专家柳比谢夫(Александр А. Любищев)、神经心理学家别赫捷列夫(Владимир М. Бехтерев)、遗传学家谢列布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С. Серебровский)、胚胎学家米哈伊尔·姆·扎瓦多夫斯基(Михаил М. Завадовский)等人陆续发表文章和著作，表明自己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信仰者。同期，还有植物学家波利亚科夫(Илья М. Полянков)、生理学家鲍里斯·姆·扎瓦多夫斯基(Борис М. Завадовский)、遗传学家杜比宁(Николай П. Дубинин)等人撰写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讨论科学问题的文章和著作。

生物学界的政治化，肇始于工农速成中学、红色教授学院和共产主义大学的毕业生们参与生物学界的辩论。生物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团体是由阿戈尔(Израиль И. Агол)、列维特(Соломон Г. Левит)、斯列普科夫(Василь Н. Слепков)、芬克里什捷恩(Евгений А. Финкельштейн)等人领导的[Агол, 1927; Слепков, 1927; Левит, 1926]。这些人既具有国内战争经验，又亲身经历了大学以及党内的肃反运动。他们积极地利用政治手段来参与生物学辩论，对持有活力论、神秘主义、唯心主义和目的论观点的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1926年11月20日，在共产主义研究院召开的辩论会上，遗传学家谢列布罗夫斯基要求与会者“驱散拉马克主义的迷雾”，“在插满马克思主义革命旗帜的共产主义研究院内与那些拉马克主义者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Серебровский, 1927]多勃尔让斯基(Феодосий Г. Добрянский) [⑧]据此认为，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生物学家之间的辩论的主要论据始于1926年[Dobzhansky, 1980, p. 230]。

除辩证唯物主义之外，当时通常还把对于建设新世界是否具有实践意义当作判断学术观点的论据。优生学家沃洛茨科伊(Михаил В. Волоцкой)曾宣称，对携带不良基因的人采取强制性预防生育(甚至采取绝育)措施将保障参与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人种更加优秀[Волоцкой, 1925]。他认为，绝育可以杜绝产生带有遗传疾病的下一代，减少社会生存密度，改变生育的无政府状态并且使社会过程按计划进行。政府还为遗传学家瓦维洛夫(Николай И. Вавилов)多次出国考察提供了大量财政资助，以确保他找到能培养出迅速获得优质高产农作物的原始品种。

那个时期，由意识形态化的辩论和审查所造成的干部调换司空见惯，其结果往往是用思想斗争的方式来掩盖露骨的个人主义。年轻的生物学马克思主义者们把传统的科学学派带头人作为自己快速获得专业职位的对手，把自己的导师和同事指责为“资产阶级科学的卫道士”。就连不少老一辈生物学家也参加马克思主义学术组织的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刊物上发表文章，以便保护或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获得财政资助、打倒竞争对手、避免遭受攻击。1925年4月，在列宁格勒马克思主义者协会工作会议上，至少有四个神经生理学不同学派的代表急于表白，自己的观点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础[⑨]。

关于在生物学研究中应用辩证法方法的争论，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各学派代表之间的思想斗争形式。由于学者们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任意宣布自己的理论和原理与马克思主义最接近、最符合，而反对者和竞争对手是反马克思主义者。有些生物学家在争论中随时改变科学观点，但每一次都声称自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现象，莫斯科治疗遗传学研究所的创建人列维特就是一例。列维特早期确信，马克思主义者有必要承认获得性特征的连续性，后来他又证明只有染色体遗传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符合[Левит, 1926; 1927]。

对生物学理论问题所进行的毫不留情的辩论，以及为争取国家对自己研究课题资助所采取的竞争，实际上已经转化为给对手扣上反动分子和世界资产阶级的帮凶等帽子。辩论参与者大都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向领导揭发对方观点和研究的危害性。当然，也有人公开表示，在生物学中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教条是有害的。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生物学家群体有较大的差异。那些年，莫斯科是引发震撼生物学领域的意识形态化风暴的源头，那里聚集了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的机构和组织。由于毗邻党中央和政府，从而加剧了竞争的尖锐化程度。

1925年底，在共产主义研究院自然科学部，机械拉马克主义的追随者与遗传学和达尔文主义的捍卫者进行了辩论<sup>[10]</sup>。由于辩论的内容涉及科学问题，每个报告都指责对方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双方的争吵达到了白热化、甚至短兵相接的程度，从而引起了众多生物学家的关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都准备“与活力论、唯心主义思潮、乃至生物学中存在的各种错误作斗争，反对在阶级利益中利用生物学成就”<sup>[11]</sup>。

1926年11月，150名生物学家和哲学家联名向共产主义研究院主席团请求成立生物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协会。但是，面对学者之间相互指责的尖锐辩论，共产主义研究院主席团显然不愿意引火烧身，半年内迟迟不予答复。担任自然科学部主席的奥托·尤·施密德（Отто Ю. Шмидт）<sup>[12]</sup>于是警告道：如果推迟对协会已经积极开展的工作给予支持，将会给生物学带来不良影响。在此警告下，该协会才被正式纳入共产主义研究院组织机构中<sup>[13]</sup>。协会拥有大约200名会员，其中不少是一流的学者。历史学家兼哲学家列文（М. Л. Левин）、医生兼遗传学家列维特（С. Г. Левит）和人类学家施密德（Г. А. Шмидт）都相继加入了该协会。协会中有一些人日后成为李森科的支持者，其中包括老布尔什维克党员勒柏辛斯卡娅（Ольга Б. Лепешинская）。她因提出从死细胞中获得“生命物质”的原则而“声名显赫”。那些年，她煞费苦心地清除苏联生物学界的“异己”分子，陷害了许多天才的生物学家。

然而，在保留了科学院风格、拥有世界著名生物学家<sup>[14]</sup>的列宁格勒却呈现出另一幅景象。这里，学者们并不注重在科学研究中采用辩证法方法论的思想。1927年前，在列宁格勒没有类似共产主义研究院的机构以及其他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研究所。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НОМ）于1919年成立，1929年被解散。在这个协会的自然科学部成员中，仅有生理学家乌赫托姆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А. Ухтомский）在科学界具有一定的威望。自然科学部通常在列宁格勒大学校长办公室召开例会，一般有10-15人出席会议，其中只有8-12名成员列席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的全体会议。学术辩论会在大学礼堂举行，对每个报告所进行的辩论更表现出科学院的学术研究风格。

普列津特从1925年起参与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自然科学部的工作。他毕业于社会学系法学部，但自认为是生物学辩证法专家。从20年代起，普列津特就在自己周围组织了大学生小组，并借他们之手一次次干扰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自然科学部的工作，迫害学部的领导人<sup>[15]</sup>。1928年春天，普列津特成为列宁格勒马列主义研究所（ЛИМ）哲学部客座研究员。该研究所由红色教授学院的毕业生和共产主义大学的教员们于1927年建立。他们都是德波林（Абрам М. Деборин）<sup>[16]</sup>的忠实追随者。普列津特附和他們，也追随德波林。他给自己提出了“建立生物过程的内在逻辑”、“以逻辑原则研究各种生物学理论”的任务<sup>[17]</sup>。

到1927年底，列宁格勒党委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不能胜任向科学家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在列宁格勒马列主义研究所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越发感到自身的生存危机，因为列宁格勒马列主义研究所的领导仗仗州党委的支持，从创办初期就试图吞并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1928年5月28日，人民委员会科学政治部批准了关于“改组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将其纳入研究所工作范围”的决定。协会和研究所曾就两个机构的差异进行了一年半的论证，然而一切徒劳。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党组迫于“上边”的压力，于1929年12月28日发表声明：由于存在类似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因此本协会自动解散，协会的财产移交给共产主义研究院。“自发自愿”的建议立即得到上级的认可。1930年初，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被正式清除，其自然科学部随即成为列宁格勒生物学马克思主义者协会的基础，但学部中只有植物地理学家奥夫钦科夫（Петр Н. Овчинников）和普列津特两人随后参与了创建“无产阶级生物学”的工作<sup>[Колчинский, 1999]</sup>。

#### 四 “文化革命”与生物学

清除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事件被称为“大转折”或“文化革命”（“культурной революцией”），在此之前，权力机构实行的是利用学术界的内部斗争的政策，并没有直接插手、干扰生物学界的辩论。由于共产主义研究院、红色教授学院和各共产主义大学的干部培养系统不能保障用马克思主义者全部替换自然科学界的“资产阶级”专家，政府于是在学术界向全体学者展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动员。

1929年4月，共产主义研究院的领导波克罗夫斯基（Михаил Н. Покровский）声称，必须停止与非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家们和平共处，逐渐消灭“对资产阶级学者的拜物教”<sup>[Покровский, 1929, p. 270]</sup>。第一届全苏马克思列宁主义机构代表大会很快就召开了，“机械论者”在会上受到了批判，德波林关于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改造自然科学的思想也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支持。德波林的反对者，包括一些被认为是机械拉马克主义追随者的生物学家，失去了共产主义研究院的领导岗位，并从此不断遭受批判和审查。

没过两年，德波林本人也被指责为向资产阶级科学投降、理论脱离实践、不问政治以及学院主义。他在生物学领域的追随者（阿戈尔、列维特、列文、谢列布罗夫斯基等）的著作被宣布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在共产主义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协会中的领导职务被以托金（Борисом П. Токин）为首的生物学辩证唯物主义者所取代。在共产主义研究院中，新成立的自然科学联合会由数学家克里曼（Арношт Я. Кольман）<sup>[18]</sup>取代施密德主持领导工作。克里曼坚信，苏联生物学界被各种坏分子占领：遗传学家霸占着优生学领地，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反对建立大型国营农场，鱼类学专家降低了水库的生产能力等等。为了同这些“坏分子”作斗争，所有研究计划都得接受共产主义研究院强行实施的意识形态审查。检查和“审查”波及到所有生物学家，德波林的追随者，也就是那些不久前还是“无产阶级的和辩证的生物学”的领导者们首当其冲，被强迫认罪。生物学中任何研究方向，乃至整个知识领域，都有可能由于被指责为脱离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以及对无产阶级充满敌意而遭到封禁。贝格（Лев С. Берг）<sup>[19]</sup>的循环进化论原理和索鲍列夫（Дмитрий Н. Соболев）的历史生物遗传学首先被禁止研究。

由此可见，建立“无产阶级生物学”的动力，并不纯粹来自同“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斗争，实际上更多是来自争夺领导权、争当党的优秀干部从而获得财政和政策上的优惠待遇的激烈竞争。获胜者通常依靠打倒前辈，并且心安理得地取而代之。托金刚刚在共产主义研究院学了一些生物学的皮毛知识，就“勇于”参与同遗传学科带头人、与政府和党中央曾有着密切联系的瓦维洛夫作斗争。托金还向联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举报列别什斯基的反马克思主义行为及其与无产阶级生物学的反对派斗争不坚决的态度<sup>[20]</sup>。现存档案中的许多文件证明，后来成为同李森科主义者作战的斗士们，都曾经利用过马克思主义来打击自己的学术对手。

普列津特是在生物界依靠“文化革命”青云直上的主要受惠者。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被解散后，他参与领导了列宁格勒生物学马克思主义者协会、战斗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协会自然科学部、共产主义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生物学部、列宁格勒大学自然辩证法和进化论教研室等许多为检查生物学界落实党的政策而设立的机构。没有一个人能像普列津特那样善于随意掀起阶级斗争风波，哪怕是对教学法和环境保护问题的讨论也不放过。他确信，“十月革命对理论界的震撼才刚刚开始……”。需要打倒一切。应该在所有机构中大力、广泛清除旧观念和旧理论”[21]。首先，他建议从遗传学和植物学入手，通过筹备全苏代表大会、改组科学协会、修改列宁格勒各高等院校所有生物学教研室的教學法和十月革命后所出版的教科书等手段，清除这些反动学派对各个机构的危害影响。他根据形势需要，在共产党文件中申明：生物学界没有科学学派，而仅有拥护党的和反党的派别之分。普列津特在这个时期的活动代表了建立无产阶级生物学的新趋势，这是传统科学学派的悲哀。演说家和雄辩家的天才、带有冒险主义的激进观点、过分渲染的“英雄革命史”、对自己人的关照、妇女们的青睐等等，所有这些都使普列津特能把许多人吸引到自己周围。但是，在这些拥护者中，有不少成为未来同李森科作战的斗士。

最初那些拥戴普列津特的年轻人皆不具备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但却急于取代阻挡其前程的“反动教授们”，急于迅速提高自己的地位。上级向他们许诺了高官厚禄，而他们则必须遵照各级党组织的指示行动。曾发动对瓦维洛夫斗争的波塔什尼科娃（Белла Г. Поташникова）[22]曾明确表示：“瓦维洛夫的问题应该征得州党委的许可”，“我们还不能对维尔纳茨基、巴甫洛夫等人进行审查”[23]。

在对“权威们”的斗争中，“审查组”审查了遗传学、生理学、生态学和森林学等学科和学派带头人的理论。他们组织讲座和讨论，审查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学计划，筹备召开生物学各领域的全苏代表大会。实验课程的审查尤为严格，因为普列津特认为，资产阶级专家们正是通过实验研究的教學方法毒害了大学生。思想偏见严重影响了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他们责骂经常展开讨论的各科学协会是学者们“为保护自身利益、逃避苏维埃社会监督”而建立的“学术泥潭”、“反动教授的堡垒”、“被精心维护的禁猎区”，是不良的学院主义者，是“纯粹科学和不纯粹政治的结合体”，是对共产党学者实施意识形态恐怖的策源地等等。为了彻底改组这些科学协会，他们采取了如下步骤：共产党员加入协会、再进行改选并组织由共产主义研究院领导的协会联合会。

在这个时期所召开的遗传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和生态学全苏代表大会表明，许多老学者都曾准备参与建立在短期内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无产阶级生物学。例如：在第一届遗传学、育种学、家庭养殖和育种畜牧学全苏代表大会上，遗传学不是被简单地作为科学门类，而是被当作可以在短期内向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提供新的家畜良种和农作物品种的创造性奇观而得到认可的。遗传学家被当作创造者。瓦维洛夫说，遗传学家应该成为创造新型有机体的工程师。他认为，有一些苏联的科研机构“已经步入世界科学前沿”，比如敖德萨的遗传育种研究所（李森科此时已经在该所工作）。谢列勃罗夫斯基改行从事社会主义优生学，实质上就是提取被认为是天才的和有价值的男子的精液给妇女进行人工授精，从而获得具有所需要特性的高质量后代。他相信，这样或许可以用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五年计划[Серебровский, 1929]。与此同时，其他的遗传学家也开始确信，参与提高农业产量和改造社会的活动是迅速获得资助的手段。然而，这种信念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实际的“丰收”。

1932年，为纪念查尔斯·达尔文逝世50周年，在生物学界召开了各种纪念会，出版了许多文集，从而使“文化革命”达到顶峰。纪念活动的发起人采取了大量政治运作手段，其目的是为了表明，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唯物主义的达尔文主义的继承者，达尔文学说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被资产阶级利益所篡改和利用。同时他们还强调了从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出发，创造性发展达尔文主义的必要性。作为动植物新品种的创造者，米丘林（Иван В. Мичурин）[24]和李森科在这个时候被树立为学习的样板。

“文化革命”给许多生物学家带来了各种不幸，给生物学界带来了不良后果。在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中，不学无术之人把持了领导岗位。大量专家被赶下讲台，其中有些人被拘捕或被判刑，有些人被流或是被投入集中营，还有一些“危险分子”被处决。

实际上，生物学“文化革命”的主要目的在于：“分化”反动权威，吸引大多数学者加入马克思主义者阵营，最终建立无产阶级生物学。但是这个目的并没有实现。一部分生物学家表面上掌握了符合政治需要的新术语，实际上却继续从事原有的研究工作。而包括维尔纳茨基在内的另一些人则公开反对在生物学中推广辩证法一类方法的尝试，他们指责普列津特之流是哗众取宠者、是讲空话的人。这些学者认清了普列津特之流的危险性与其危害性并予以批判反击。就连一些生物学辩证法化的发起人也承认，这种倾向损害生物学的发展。著名的植物形态学和分类学家科佐-波利扬斯基就曾声明，自己拥护机械论是因为听信了在机械论和活力论之间二者必择其一的观点。

与此同时，一些哲学家也确信无法改变生物学家们的反对立场。列宁格勒战斗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协会主席迪缅斯基（Григорий С. Тымянский）指出，本协会的名称本身就排斥了自然科学家。一些加入这个协会的大学生也避而不谈“批判教师”、与“反动教授”作斗争等口号。该协会理事会承认：“我们对无党派教授们所作的全部努力徒劳无益”[25]。照普列津特的话讲，那些被州党委动员过的共产党员“仅在努力尽快填满成立各种协会的表格，实际上甚至连这些协会叫什么都不清楚”[26]。从表格上可以看到，大多数填表人并不了解自己所加入的协会。很快，在各个主席团、理事会和机关的无数次例会中充满了缺乏学者们的支持、基层组织消极等各种抱怨。匆忙上阵的研究生们无法驳倒生物学家，这就为“大清洗”提供了契机。不久，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国家安全机构）开始拘捕并流放那些顽固不化的人。

普列津特也受到指责。从1932年1月起，研究院党委不止一次地提醒：由普列津特领导的生物学部没有掌握揭发生物学界敌对学派的主动权，而且对在列宁格勒举办的学术讨论会所进行的审查力度不够。例如：在动物区系学全苏代表大会上竟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寄生虫学毫不相关；对自然界应该谨慎干预”等仇视社会主义的观点。

普列津特抱怨无产阶级生物学的建立遭到学者们装聋作哑般的抵制，甚至一些党员生物学家也参与其中，只是表面上赞同辩证唯物主义。例如：苏卡切夫（Владимир Н. Сукачев）[27]承认，自己思想中带有布哈林动平衡原理的机械论倾向，以致在寻找植物分类和社会之间的类似之处时犯了错误。但在森林技术研究院召开的批判苏卡切夫以及其他“反动教授”学术活动的辩论会上，对苏卡切夫的指责并没有得到党员们的支持。在鱼类学研究所，克尼波维奇（Николай М. Книпович）[28]为保护多格尔（Валентин А. Догел）[29]和贝格不受批判，同普列津特之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克尼波维奇指出，普列津特对多格尔和贝格的攻击不仅是不可靠的，而且证明了普列津特对生物学一无所知。维尔纳茨基则公开申明，建立“无产阶级自然科学”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倒退：“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和浅薄的工作人员”正在窃取研究资源[30]。

1929年苏联科学院改组，补充了大量共产党员。历史学家沃尔金（Вячеслав П. Волгин）和能源学家克尔日扎诺夫斯基（Глеб М.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成为新的领导人，他们力求保护生物学研究所远离接踵而来的“大清洗”[31]。1933年，他们上书工农监察人民委员会，反对缩小生物学联合会，并坚信科学院“已经从反动分子的堡垒变成完全苏维埃式的国家科学工作者的学术机构”。新领导人认为，缩小生物学联合会将导致对研究资源的破坏，将影响完成国家的重要任务。最终结果是，生物学联合会减少了门

## 六 普列津特和李森科联盟伊始

普列津特在挫折中汲取了教训，意识到自己应该在党的领导阶层寻找能为建立“无产阶级生物学”奠定理论基础的代言人，而在列宁格勒的知名学者中没有自己所需要的人。据笔者推测，普列津特于1932年2月与李森科达成合作协议[32]。同年夏天，普列津特带领一批研究生和大学生前往敖德萨与李森科会晤，情投意合的联盟随之得到完满实现。从他们之间的往来信件中可以得知，秋天他们已经合作出书[33]。这预示着“米丘林生物学”即将登上历史的舞台。

1932年夏天，在普列津特走访李森科这段时间里，为了在生物学界贯彻马克思主义，政府开始对各个机构和刊物实行大清洗。首先清除了在“文化革命”期间辩论积极的机关团体，撤换了列宁格勒自然科学界的主要领导人。普列津特看清了形势发展，领会到生物学界唯一正确的准则就是必须顺从斯大林的政策，因而在大转折的关头抓住了时机，及时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并成功地找到了“无产阶级生物学”的代言人。当1948年李森科学说在全苏农业科学研讨会8月会议上被确立为唯一可靠的、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学说时，普列津特的“成功”可谓达到了“光辉的顶点”。相形之下，其他“执迷不悟”的人，包括不少富有才华的生物学家，几乎都死于后来的镇压之中。

## 七 结论

与德国的种族卫生学和优生学相比，苏联的“无产阶级生物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获得成功。苏联并没有出现德国那样由卫生学家和优生学家组织的群众运动，也没有出版过马克思主义的生物学教科书。

接二连三的运动和口号，使许多学者意识到，参加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会受到更多的打击和迫害。那些一心追随当局政策的人非但没有得到保护，反而被自己所建立的“无产阶级生物学”所毁灭。学者们同时也意识到，在辩论中持消极态度也不能保护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欲使科学研究进行下去，就必须起来抗争以维护科学界的利益。20世纪30年代中期，参与同普列津特、李森科作斗争的遗传学家们首先明白了维护自己利益的必要性。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专业的生物学家聚集到这些遗传学家周围。而到了50年代，则有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化学家加入到这个群体中，共同反对当时在生物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严重威胁科学研究自由发展的李森科主义。

“无产阶级生物学”的流产，促使政府采取了新的科学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党领导科学的价值系统。苏共领导层更加坚定地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够确定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研究的自由度以及主要研究方向。在学者和权力机构之间的无休止的抗争过程中，广大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蔓延，最终发展成为导致国家解体的社会政治运动。

后记：本文经作者许可，由鲍鸣根据作者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的报告原稿编译。

## 参考文献

### 原始文献

Архив РАН. Ф. 350. Оп.2. Д.48. Д.51. Д. 112. Д.115. ; Ф. 1588. Д.103; Ф.1593. Д.128.

ПФА РАН. Ф. 4. О.28. Д. 46; Ф.235. Д.7; Ф. 238. О.1. Д.126; Ф. 238. Д. 20. Д. 96; Ф. 239. Оп.1.Д. 32а. Д. 35; Ф. 240. О.1. Д.5. Д. 22.Д. 35.

### 研究文献

Агол И. И. (1927).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 в эволюционной теории. М.

Behrendt L.-D. (1997). Die Institute der Roten Professur: Kaderschmieden der sowjetischen Parteintelligenz (1921-1938). Jb.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Bd 45. 4: 597-621.

Берендт, Л. Д. (2002). Институт «красной профессуры»: кузница кадров совет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 За «железным занавесом»: мифы и реалии советской науки. СПб.

Beyrau, D. (1993). *Intelligenz und Dissens: Die russischen Bildungsschichten in der Sowjetunion 1917 bis 1985*.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 Ruprecht.

Серебровский, А. С. (1927). Вестник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19:231-232.

Серебровский, А. С. (1929). Антропогенетика и евгеника 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Медико-биол. ин-т, М.1: 3-19.

Слепков, В. Н. (1927).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 в биологии.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 **10-11**: 249-262.

David-Fox, M. (1997). *Revolution of the Mind. Higher Learning among the Bolshevik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obzhansky, Th. (1980). The Birth of the Genetic Theory of Evolu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20-s. *The Evolutionary Synthesis: Perspectives on the Unification of Bi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itzpatrick, Sh. (Hg.) (1978).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Fitzpatrick, S. (1992). *Power and Culture Front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Joravsky, D. (1970). *The Lysenko Affai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oravsky, D. (1989). *Russian Psychology. A Critical Histor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Josephson, P. (1996). *Totalitar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Jersey: Atlantic Highlands.

Козлова, Л. А. (1994). Институт Красной Профессуры (1921-1938 годы).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 96-112.

Колчинский, Э. И. (1999). .В поисках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философии и биологии: Дискуссии и репрессии в 1920-е начале 1930-х гг. СПб.

Krementsov, N. (1997). *Stalinist Sc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Левит, С. Г. (1926). Эволюционные теории в биологии и марксизм. Медицина и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1**:15-32.

Левит, С. Г. (1927).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в медицине // Вест.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едицины. **23**: 1481-1490.

Medvedev, Zh. (1969). *The Rise and Fall T.D. Lysenko*.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1929).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Вестник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33**:270.

Soyfer, V. (1992). *Lysenko and the Tragedy of Soviet Science*.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Тамм, И. Е. (1995). В дневниках и письмах к Наталии Васильевне. Природа.**7**:148.

Волоцкой, М. В. (1925). Классовые интересы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евгеника. М., Жизнь и знание.

Weiner, D. (1988). *Models of Nature: Ecology, Conservati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oviet Russia*.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

作者简介: 埃·伊·科尔钦斯基 (Э. И. Колчинский), 哲学博士、教授, 俄罗斯科学院自然科学和技术史所圣彼得堡分所所长。

[②] 指在魏玛德国和美国产生的“大萧条”。